

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对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超越*

张雷声, 王 坚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悖论性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贫困现象, 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20世纪30年代以后, 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修复悖论性贫困, 提高雇佣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 但最终都“无功而返”, 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陷入“两极分化”困境和“福利过度”陷阱。而反观中国, 经过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地探索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不仅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 还促进了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超越, 为促进全球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 悖论性贫困; 雇佣劳动; 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3)02-0127-07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mmon Wealth beyond the Paradoxical Poverty of Capitalism

ZHANG Lei-sheng, WANG Jian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Paradoxical poverty is a unique poverty phenomen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and an inevitable product of capitalist system. After the 1930s, capitalist countries tried to repair paradoxical poverty and improve the material living standards of employed workers in various ways, but ultimately “failed”, and capitalism inevitably fell into the trap of “polarization” and “excessive welfare”. In China, after years of exploration, 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in successfully exploring a new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eatur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crea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y have not only completely eliminated absolute poverty, but also promoted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people and overcome the paradoxical poverty of capitalism. It has contributed to the promotion of glob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paradoxical poverty; employed workers; common wealth; Chinese modernization

悖论性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贫困现象。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贫困表现为一种悖论性贫困, 即“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 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 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 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1]156} 近年来, 伴随着

新科技革命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 手动生产向半自动化、自动化生产转变, 呈现出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等新特征, 劳动生产率、资本利润率不断提高。但尽管如此,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 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却没能消除

* [收稿日期] 2022-10-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百年探索及原创性贡献研究(22YJA710001);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年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 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作者简介] 张雷声(1954—), 女, 安徽芜湖人,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王坚为本文通讯作者。

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甚至还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其陷入了“两极分化”困境和“过度福利主义”陷阱。反观中国,经过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地推进和拓展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超越。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上指出,“我们坚持精准扶贫、尽锐出战,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2]7},推进了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奋斗目标

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3]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坚守的奋斗目标,“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共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4]

(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对现代化问题进行过论述,但是他们对未来新社会的构想却始终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以及实行按需分配相联系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扩大和物质财富的丰富不仅不会改变工人贫困状况,而且还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只有进入未来社会,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和生产才能“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5]460}。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6]200}。同样,不断增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7]299},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革命的推动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5]460}。他们提出,无产阶级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就必须组

织起来成立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8]42}。“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9]44};“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44}。共产党人也更了解无产阶级运动,是各国工人政党中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只有共产党人才能领导工人阶级最大限度地增加物质财富,提升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为探索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列宁开启了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一方面,列宁提出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于“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系统+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9]520},要大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社会财富和科学技术,推进社会主义电气化进程。在列宁看来,“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因为不实行电气化,要振兴工业是不可能的。”^{[10]30},苏维埃政府必须要通过推进电气化来振兴工业,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夯实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列宁认为发展合作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我们要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11]366}通过走合作社发展道路一边提升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一边提高农业的电气化、工业化普及率,大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加社会财富。列宁关于发展电气化和合作社制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致力于探索中国的现代化。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究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时,就提出要把中国从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家,“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2]146}。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并且提出逐步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两化”目标。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除了继续强调通过工业化推动生产力发展以外,还十分重视发展社会主义合作制,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毛泽东在

1966年谈农业合作化问题时明确提出,要通过实现合作制“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3]437}，“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13]426}。在毛泽东看来,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工业化与合作社制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13]495}。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为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二)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我国城乡的普遍贫困问题和“一大二公”的僵化体制,邓小平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4]393}“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14]226}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5]163}此后他又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具体化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提出:“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5]162-163}。在邓小平看来,搞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要始终立足“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目标在于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邓小平还明确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的小康目标。他指出,“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14]54}而“小康社会”的标准也就是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即“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14]54}。随着邓小平认识的深化,他又在“翻两番”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明确第三步是在21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也就是到21世纪中叶实现再“翻两番”的目标,大体达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四千美元的目标,使人民富裕起来,“使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14]226}。除此之外,为了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还提出了“先富后富论”,即我们既要允许差距又要防止“两极分化”,“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

达到共同富裕”^{[12]195},通过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富。这些重要思想揭示了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发展。

世纪之交,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围绕如何建设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江泽民指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16]132}“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17]446}胡锦涛提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复兴”^{[18]321},并且还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19]956}。总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得到了深入探索,物质条件和制度保障也逐渐建立。

(三)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探索与卓越成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化局加速演进。从国内来说,虽然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使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了飞速发展,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依旧存在,严重影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经过艰辛努力,我国如期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更加殷实,奠定了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从国外来看,由于美西国家固守冷战思维,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技术封锁横行,导致南北之间贫富分化严重,“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3]。面对这种状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的高度,强调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22}。“我们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2]22}在习近平看来,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4],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

习近平深刻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2]22},必须从战略上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需要分阶段分步骤实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的中国

式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即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之,进入新时代以来,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探索的新成果,而且在实践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比2021年增长5.0%。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283元,增长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3元,增长6.3%。新时代中国在共同富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极大地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

二 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及其修复的困境

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产生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困境及必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与劳动的分离是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生成的前提条件,雇佣劳动制是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制度根源,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是悖论性贫困的一般性趋向。一旦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超过其所能容纳的限度之后,“这个外壳就要爆炸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大危机爆发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消除悖论性贫困进行了不懈探索,虽然采取措施进行了修复,但依旧陷入“两极分化”困境和“福利主义”陷阱,给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全世界都带来了巨大灾难。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

(一)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制度根源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如果资本不剥削劳动力,资本就会灭亡,而要剥削劳动力,资本就得购买劳动力”^{[1]728},资本与劳动的分离构成了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制度根源。资本完成原始积累以后,整个社会就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方面,无产阶级没有别的商品可卖,自由得一无所有,不出卖劳动力就不能够过活,“工人是以出卖劳动力为其收入唯一来源,如果他不愿意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1]717};另一方面,资本只有购买到劳动力才能够实现价值增殖,“如果资本不剥削劳动力,资本就会灭亡,而要剥削劳动力,资本就得购买劳动力”^{[1]728}。马克思由此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1]158}。

同时,资本主义受制于资本的增殖逻辑,“资本利润”是以资本积累为前提的,最大限度榨取和剥夺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根源。资本家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剩余价值就必须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只要工人“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20]349}。雇佣工人的悖论性贫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诞生之时就是注定的,任何形式上的掩盖都无法改变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实质,“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156}。从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一般性趋向来看,随着不断增加的财富在私人手中积累和对价值增殖的追求,剩余价值被持续投入生产,实现扩大再生产;而现代工人生产状况却没有随着工业的进步而得到改善,相反,由于资本集聚和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困,“工人变成了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的增长还要快”^{[8]43}。由此,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制度困境,并且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消除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资本主义发展趋向也必然是“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20]743-744},任何力量都无法扭转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赤贫化、普遍化发展的一般性趋向。

(二)资本逻辑极化扩张中对悖论性贫困修复的失效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必然会导致资本逻辑扩张极化,加剧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习近平指出:“一些西方国家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长期存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21]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作用下,资本对利润的贪婪像“永动机”一样无法停止下来,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雇佣劳动生产效率和强度极大提高了,原来“1个工人做5个、10个乃至20个人的工作”^{[1]739}。同时,雇佣工人也被分化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成为“金领”“白领”“蓝领”“灰领”等不同收入群体,体力劳动、重复性劳动报酬在价值分配的比重逐步降低,而剩余价值率却不断提高,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出现几倍、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的差距,加深了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使其陷入两极分化困境。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资本与权力相互结合垄断了社会财富,使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对立,一些垄断资本集团乘机掠取到超高资本回报,又进一

步扩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美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总净资产为36.2万亿美元,首次超过占总数60%的中等收入家庭的总净资产(35.7万亿美元)”^[22]。相比20世纪70年代占总数不到35%的中等收入家庭的总资产,扩张了近一倍。面对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困境,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扩展资本主义信用、增加政府投资等时间延展和空间扩张的“时间—空间”修复方式,消除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困境,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也正如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得出来的结论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两极分化必将加剧。^[23]总体而言,在资本主义“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价值伦理和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虽然能够创造出丰盈的物质财富,但是却无法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公平分配,以至于极少数的资本家控制着绝大多数的物质资源,而绝大多数人处于悖论性贫困之中,使得资本主义仍深陷于两极分化困境之中。

(三) 社会保护逻辑极化下对悖论性贫困修复的“福利过度”陷阱

“福利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再分配制度,是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另一种修复方案,二战以后在欧美国家广泛推行。一般来看,福利主义被认为是德国俾斯麦“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政策,其“社会福利种类繁多,覆盖面广,主要提高中下层收入者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制度化、法律化;各种福利补贴(如:家庭补贴、医疗补贴、住房补贴)惠及广大民众”^[24]²³。时至今日,福利主义再分配制度在西方社会仍然产生着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被看成是对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修复方案。“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不但已经体系化、社会化,而且力度很大”^[25]³⁶⁴,影响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方方面面。根据相关数据,当前“英国社会福利项目近60种,美国公民从出生到死亡可以享受2000多种的政府福利,北欧的瑞典、芬兰等国更是被誉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和示范‘橱窗’”^[26]。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如果离开了必要的制约和平衡,脱离了国家发展实际的制约,就必然会陷入“福利过度”陷阱,不仅不能修复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还会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赤字激增、债台高筑,最终难以为继。大体上看,资本主义福利主义是通过资本主义再分配为社会成员提供高福利供给,所有的支出都依靠国家财政负担,但是在西方选举政治和民

众对社会福利的期望值不断增长的作用下,福利主义“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征表现更加明显,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这种忽视“需求与可能”“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福利过度”方案久而久之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债台高筑,最终难以为继。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现状来看,这种透支国家未来财力的福利主义修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问题,但是给国家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2009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

除此之外,无所不包的“福利过度”主义修复还极易使民众丧失工作意愿,从而又滑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发展,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动环境不断恶化,一边是工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雇佣工人的工作时间、工作效率被提高到极限程度;另一边工人工资又被压缩到“最低工资额”以下,“购买例如有四个劳动力的一家人,也许比以前购买家长一个劳动力花费得多一些”^[20]⁴⁵⁴,这将引发越来越多的雇佣工人排斥工作、选择“躺平”,宁愿依靠国家福利来维系基本生活,也不愿通过劳动获取收入,改善自身贫困状况,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如今不少的西欧国家、拉美国家都陷入了“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福利主义”修复窘境。

总之,无论是“两极分化”困境还是“福利过度”陷阱都反映了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一般性发展趋向。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逾越的制度困境,表明任何资本主义修复方案都只能起到延缓贫困的作用,而不可能扭转悖论性贫困的一般性发展趋势,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三 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对悖论性贫困的系统性超越

如上所述,西方国家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修复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必然会陷入“两极分化”困境和“福利过度”陷阱。而“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通过坚持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系统性超越。促使其成功的经验和方式主要有: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相结合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

和独特优势。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决不会将人民群众的利益当作换取资本支持的政治资本。中国共产党还坚持从全局、大势、长远出发谋划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走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一小部分富裕、绝大部分贫穷”的“资本至上”的发展路径。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能够做到“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保证了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具备的特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证。“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既明确发展的重点、次序、路径、方法,又确保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有效形成了各方共推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受制于西方政党利益的牵绊,不同政党之间相互攻击、相互拆台,不仅破坏了国家经济的有序运行,还导致社会的分裂和分化,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聚焦于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党中央坐镇中军帐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既公正合理分配社会发展成果,又能分清轻重缓急让社会资源发挥最大效益,还能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激发出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动能。

实践充分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相结合,是中国“抵御风险挑战、聚力攻坚克难的根本保证”^[27],彰显了巨大优势,保证了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早日实现。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激发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相结合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28]^[11]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要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同时又防止演变成“为人民代劳”、搞福利主义“养懒汉”,不断激发出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生

动力,实现对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超越。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理念不同,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让少数人致富而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为此始终通过“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明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人民的诉求,集中力量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提升民主政治、精神文化、社会生活、生态文明等方面供给水平,既保证人民物质生活充裕,又实现政治民主与政府廉洁、精神文化产品多种多样、社会生活和谐稳定、生态环境优美宜居、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解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公共资源供给不平等不均匀的问题,促进公共资源合理分配,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把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作为衡量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尺度。

另一方面,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还不断激发出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古人云:“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与资本主义修复方式不同,激发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不是通过激励工人阶级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来提高工人工资,改善生活水平,而是通过强化“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3]的奋斗观,鼓励劳动致富、劳动创富,增强就业创业本领,倡导在就业创业中实现人生价值来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通过“畅通向上流动通道”,保障社会公平、机会均等,使人人都能享有出彩的机会,形成人人参与发展、助力发展的社会环境,以此破除“阶级固化”“两极分化”等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发展困境来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历史充分证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激发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相结合,既能保证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又能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导向。

(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与构建“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相结合

“两个毫不动摇”基本原则和构建“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是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做大做强“蛋糕”和分好切好“蛋糕”的具体举措,是经过实践证明的有效举措。与资本主义“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不同,社会主义“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以不需要像资本主义那样,借用信用扩张和超前投资等修复方式来缓解困境和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一边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做大做优做强国有经济,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基础上,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一边构建“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

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来看,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公有制经济和国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压舱石、稳定器,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做大做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蛋糕”,为促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夯实物质保障。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效利用和驾驭资本逻辑,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

构建“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是对资本主义工资制度和“福利主义”的超越,对于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提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2]初次分配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强调“效率优先”“物质激励”,既要通过做大做强我国发展“蛋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又要防止出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或是福利主义“养懒汉”现象;再分配制度是对地域差异、城乡差异、群体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距问题的调节,既保证公平公正分好中国发展“蛋糕”,又防止出现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现象,是对“效率优先”“物质激励”的弥合;第三次分配“注重公平”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充完善,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彰显。因此,构建“三次分配”制度是分好中国发展“蛋糕”的有效举措,通过“限高、扩中、提低”的举措,既能消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又能防止滑入其存在的福利主义陷阱,是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性制度设计。

事实充分证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基本原则与构建“三次分配”制度相结合,既能通过做大做强经济发展“蛋糕”,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优势,又能通过

公平公正分好“蛋糕”,让社会主义发展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总而言之,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系统性超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并已经实践证明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而且拓宽了发展中国家对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为促进全球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求是,2021(20):4-8.
- [4] 习近平.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2023-02-08(01).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3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4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4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2] 毛泽东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3] 毛泽东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6]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7] 江泽民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8] 胡锦涛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1] 习近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J]. 求是,2022(10):4-9.
- [22] 张梦旭. 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N]. 人民日报,2021-10-19(17).
- [23] 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M]. 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24] 刘儒. 当代资本主义专题研究[M]. 北京:红旗出版社,2020.
- [25] 吴忠民. 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 [26] 王春华. 从法国罢工事件透视西方福利制度的缺陷[J]. 中国工运,2011(3):50-51.
- [27] 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2-26(02).
- [28]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